

談中國政治的特殊運作方式

• 王 毅

在迄今有關「反右」運動的研究中，金觀濤、劉青峰先生的〈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是值得重視的一篇文章^①。這不僅因為文章揭示了從「延安整風」到反右直至文革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種政治運作模式不斷循環的結果，而且更因為文章進一步指出這種模式的產生實具有中國特有的文化成因。從這個角度來看，文章所強調的「在研究反右運動起因和共產黨政治路線變遷機制中，有一個重要方面長期被忽略，這就是某種中國特有的群眾運動模式對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塑造」，的確比僅僅從「陰謀」、「陽謀」等毛澤東個人統治權術的運用，或是自由派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等等直接角度來研究反右運動更為深入。

金、劉先生的文章描述了以下兩個重要史實：(1) 毛澤東一生中三次運用「群眾運動+道德自省」的方式，實現了意識形態的高度一元化，實現了自己在全民意識形態中一次比一次更為廣泛、更為絕對的統治；(2) 毛澤東多次純熟地將上述成果(尤其是意識形態中的操作模式)迅速而直接

地轉化為自己在政治鬥爭領域中的基本資源。看到上述史實中蘊含的內在聯繫之後，我們很自然地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毛澤東的「山溝馬克思主義」中，為甚麼只有憑藉群眾運動和道德自省的方式才能進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基本運作？而在毛澤東那裏，意識形態中的運作為甚麼總是與對黨內政治敵人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緊緊聯繫在一起？這些疑問，當然就屬於金、劉先生在文章結尾所提出的「群眾運動、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究竟是一種甚麼關係？它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中扮演甚麼角色？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並持久思考的問題」。

認真回答這些疑問需要非常細緻的研究，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國本土文化或者鄉土文化特點的角度發現一些線索。韋伯把前理性社會的特質歸結為「巫魅」，因此「山溝」主義也就注定無法擺脫這種基因的支配。以毛澤東醉心的「群眾運動」為例，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突然向彭德懷發難的講話中，用民眾朝拜神明時的虔誠與踴躍為例來說明1958年「群眾

在毛澤東的「山溝馬克思主義」中，為甚麼只有憑藉群眾運動和道德自省的方式才能進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基本運作？而在毛澤東那裏，意識形態中的運作為甚麼總是與對黨內政治敵人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緊緊聯繫在一起？這些疑問值得我們注意並持久思考。

運動」的真理性，並據此批評彭德懷等人消極對待「群眾運動」②：

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嶺岬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參觀，……徐水、七里營聽說也有這麼多人參觀。……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三個地方（王註：指徐水等地的人民公社）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

又如1958年，毛澤東以東漢末年廣大民眾信奉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的信仰方式和神會組織方式，作為人民公社群眾運動的藍本，他親自註釋《三國志·張魯傳》並下發黨的領導階層，還明確指出：「現在的群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可見不論是50年代的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還是後來的文革，所有這些「群眾運動」都是以國民心理層面「無限信仰」的傳統方式為支柱的，而這兩者之間何以具有必然的聯繫，就非常值得研究。

再比如金、劉反覆指出民眾「群體修身」與「毛澤東迷信」、全民投身道德理想國構建之間的必然聯繫，亦有必要細究。傳統社會外在制度理想的實現（「外王」），必須建立在其社會成員廣泛具有與之相應的人格追求（「內聖」）之上；而這種對應模式幾乎絲毫未加改變，並一次又一次在反右的道德批判和自我批判、後來的「學雷鋒」乃至「鬥私批修」等等運動中出現。在傳統社會中，「群體修身」一般總是與其對「無限信仰」的強化互為表裏的，例如胡適的〈四十自述〉、魯迅的〈五猖會〉等文中都記述了民眾通過

在神面前懲罰自己不潔肉體的辦法來實現道德完善。此外，還有許許多多非常直接的傳承。比如文革時報刊上充斥着把「私」當作敵人「堡壘」的比喻和聲討，呼籲要「放手發動群眾，……使每個人都當向『私』字進攻的『爆破手』」③。再舉一個古今相同的「鬥私」方式的例子：

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④。

先生（即程門四弟子之首謝良佐）為學，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之是禮與非禮者⑤。

而60年代最流行的潮流，竟然也是人人「就身上做工夫」，也就是人人用「課簿」逐條記下自己每天的私心表現，以便對照克服⑥：

進了學校，首先就是學王杰。……我好虔誠呀。真是認真地寫自己的日記呀。哪天哪個事做的對不對？學王杰天天問自己五十個「為甚麼」。

所以當時全國人民的楷模王進喜的警句是：「成就和功勞必須記在黨的賬上，自己的小本子上只能記自己的缺點。」

最後來看，從反右直至文革，群眾性運動和道德自省運動為甚麼總是與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互為表裏的。現在每年重溫一次的「學雷鋒」，總是宣揚「雷鋒精神」的內容就是捨己為人、扶老攜幼；其實大家都知道，60年代人人都必須背誦的《雷鋒日記》，其中一句極要緊的格言是：「對待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群眾的道德自省和群眾對「大救星」的迷信，直接而迅速地轉化

1958年，毛澤東親自註釋《三國志·張魯傳》並下發黨的領導階層，還明確指出：「現在的群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可見這些「群眾運動」都是以國民心理層面「無限信仰」的傳統方式為支柱的。

為「路線鬥爭」的巨大動能，這種模式和路徑在延安整風、反右、文革中一再重複的出現。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模式和路徑是由遠比儒家文化更原始和偏狹的文化基因（更「山溝」化的文化基因）所決定的。仍然用毛澤東崇尚的以「五斗米道」為信仰核心的民眾造反運動為例，它在晉代的情況是⑦：

（首領）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

一望可知，在這種「巫魅」型的狂熱「群眾運動」中，對教主的「敬之如神」注定要與民眾的狂熱獻身和他們對異己者的「戮及嬰孩」互為表裏，而這種機制在歷代始終沿襲不絕。例如北魏後期，「（劉靈助）自謂方術堪能動眾。……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⑧。對於哪怕是不積極參與者，也要動用震世之威「共屠之」，這與後來我們非常熟悉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之類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知道，「無限信仰」的建立和強化為甚麼總是與仇恨異端和異文化的態度緊緊相連。

在文革期間，這種「巫魅」的例子亦不少見。曾被毛澤東樹立為全國「鬥、批、改」樣板的北京新華印刷廠，就是此中的典型例子：

……組織群眾憶苦思甜，吃憶苦飯、演憶苦戲、唱憶苦歌；……有一次吃憶苦飯的時候，大家一邊哭一邊吃

飯。……大家在這個時候對中國赫魯曉夫越批越氣憤，一氣之下，就把本廠一小撮走資派提到食堂，就地批鬥了一番。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種以憶苦、感恩、效忠等等內容開頭，而以對「牛鬼蛇神」的殘酷鬥爭、「批判」為結束的模式，是那時億萬次此類「群眾大會」的標準程序。其所以如此高度一致，就是因為在「無限信仰」、「群眾運動」、仇恨異端等等巫魅型文化因素之間，存在着深刻的內在邏輯和共生關係。而反右的意義，則在於為這種邏輯和共生關係的展現提供了空前充分的操作空間，並且為其以後的進一步膨脹提供了成熟的路徑。

註釋

①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4月號，頁21-34。

②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130。

③ 解放軍某部紅九連黨支部：〈開展群眾性的破私立公運動〉，《紅旗》，1967年第1期，頁51。

④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

⑤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上蔡學案〉。

⑥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頁205。

⑦ 《晉書》，卷一百，〈孫恩傳〉。

⑧ 《魏書》，卷九十一，〈劉靈助傳〉。

王毅 1954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北京三聯書店《愛樂》叢刊特約編審。曾發表文史哲及宗教、建築園林和文革研究等方面的多種論述。

60年代最流行的潮流是人人「就身上做工夫」，也就是人人用「課簿」逐條記下自己每天的私心表現，以便對照克服。所以當時全國人民的楷模王進喜的警句是：「成就和功勞必須記在黨的賬上，自己的小本子上只能記自己的缺點。」